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五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二一期 ——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12f）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十二月

唐 郎

【往事追忆】“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杨小凯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十二月

• 唐 郎 •

◇ 一九六六年

1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 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说：1 1 月 2 6 日前到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 1 2 月 2 0 日以前，免费乘火车返回原地。从 1 2 月 2 1 日起，在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外地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也须在 1 2 月 2 0 日前返回原地，1 2 月 2 1 日后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凡返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徒步长征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1 2 月 1 日，北京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在辩论会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提出三条意见：一、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二、中央文革小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招摇撞骗。三、中央文革小组把谭立夫打成右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 1 1 月下旬到 1 2 月，北京连续出现了“老红卫兵”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件。1 1 月 2 4 日，北航《八一纵队》组织连续贴出《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被认为是“大规模炮轰中央文革的第一号信号弹”。不久，“老红卫兵”就在各院校内和北京市许多街道，包括天安门，贴出了“中央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等标语，还有一些大字报点名批

评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的一系列讲话。12月5日，在林业学院的辩论会上，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提出：一、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二、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犯错误吗？三、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四、尽管江青的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评。

12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2月3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说：工交系统也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交系统也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岗位上的人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纯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达到的是多方面的，应当达到巩固政权，巩固所有制，必须思想革命化，这是就国内来说；对国外来说，在马列主义的阵营中要树立抗修正主义的典范。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点损失，其它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份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以促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的，还可以立杆见影。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干部大批判、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是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不服气，就对立。所以我说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派，总是有错的，错误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的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也要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的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地打下去。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全文如下：一、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二、贯彻运行以毛主席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派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准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创建文革组织的权利。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

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实践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2月12日，北京造反派10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人。

12月13日，《红旗》杂志第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全文见本刊zk0212e）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共有10条，主要内容是：一、抓革命促生产，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三、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四、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全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象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七、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坚持文斗，不用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八、对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绝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造反。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工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十、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议宣布“西城区纠察队”等中学红卫兵组织是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予以解散。江青在讲话中说，“西城区纠察队”等组织中“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她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的名，说他们是支持这个组织的，对此要负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犯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也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康生在讲话中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红卫兵运动推动了全世界的青年人，他们向往你们，赞扬你们，崇拜你们，希望他们在国家里能够像你们现在这样幸福。

12月16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全文见本刊zk0212e）

12月17日，“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会。江青首先话，她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为什么他们还干出那么多坏事来，就是因为那么一小撮人他是当权派。当权派掌握一部份政权，因此要推翻他。陈伯达随后说：敌人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代表，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12月18日，江青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并发表讲话。江青说：你们把坏家伙揪出

了，斗够了送到公安部关起来。然后再随叫随到。北京市公安局肯定有问题。公安局多年不执行主席的指示。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指全总书记，主席）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进城16、7年来，官僚机构重重迭迭，学校也是这样，我们这次要搞掉它。……让王光美回去做检查，这是合理的。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国务院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故意通过王任重拖我们去犯错误。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杨力时说到：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份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了进来，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大学文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法律等领域。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过去的教育制度没有改变。……学生要读17年的书，时间太长了。书的内容也都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在学校，马列主义是不合法的，不让进入课堂。革命，要靠群众，靠多数；少数人是靠不住的。要把90%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1%到3%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只讲好的，不讲黑暗面，是不行的。

12月26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红色造反者总部”代表。

12月27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

12月29日，毛泽东批示转发林彪27日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27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向林彪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林彪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作，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三条：1.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即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2.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判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判。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3.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通知》说：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全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作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作法。

1 2月30日，以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成立。“省联总”成立当日，即查封了《浙江日报》，由“省联总”主编的《新华电讯》临时替代。

1 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办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军事训练内容，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干部和战士。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20天。

◇ 一九六七年

1 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批文说：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错误，但在中央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9个多月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希望天津市驻军和群众提高警惕，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四、中央同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97名委员组成，解学恭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任副主任。

1 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知》。《通知》说：“近来，在某些地区发生了盗窃、抢夺铁路仓库、货场和火车上运输物资的事件，对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还有的盗窃危险物品，对人民生命造成了威胁。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通知》规定：一、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有责任保护，不得侵占和抢夺铁路运输的物资。更要严防敌特、内奸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和盗窃。二、对于盗窃、抢夺铁路运输物资的盗窃集团、盗窃犯，必须发动群众坚决破获、逮捕首犯，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三、铁路、交通运输系统的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当地驻军、解放军护路部队及公安机关、各群众组织，必须保护铁路畅通，保证运输物资的安全。

1 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拟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当组织有各派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进他们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大力推动他们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同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采取这种政策将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使还没有建立革命领导班子的地方能更迅速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使那些已经成立临时权利机构地方的革命政权更加巩固。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只有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方法，才能够正

确解决同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这类性质的矛盾。而用高压、排斥，一派单独夺权等项方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特务、叛徒等坏人用种种方法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则继续保持警惕。”

1 2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文件说：党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批示”下达后，广大党员和群众反映很热烈。文件将反映归纳为4个问题。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1.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思想问题。2.发动群众讨论，听取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判，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述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3.犯有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在尚未承认错误并取得群众谅解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关于吸收党员的条件：1.以毛泽东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和林彪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注意阶级成份，但也看思想表现。2.根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3.吸收有造反精神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要将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党。三、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

1 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要求：农村基层的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央《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的原则进行。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画脚，不要串联。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寨的经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般不要动，也不要搞捐献。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

1 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一极重要的文件发给你们。这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是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指针。它不仅对大、中、小学校的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导和启示作用。”《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是由陈伯达主持摘编的，共收入1927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讲话、语录等51条。

1 2月8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中央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林彪发表讲话说：“我军历来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其为解放军。我军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管灵魂、管革命化的，是各行各业的总管。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是人民得到一切或者丧失一切的头等问题。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1968年1月19日，中央军委批转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报告》称林彪的讲话“是对我军几十年来建军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最好总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方向”。

1 2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此后,军队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均大量吸收战士参加。当天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1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一、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二、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知》要求:“凡有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1968年1月20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

1 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就“绝对权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批示的全文是:“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12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发出《通知》,要各地对毛泽东的批示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1 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决定》宣布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由康健民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决定》还同意兰州军区8月18日公告,把青铜峡武斗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1979年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宣布撤消上述《决定》,为其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 一九六八年

1 2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作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报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有3000名职工,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阶级敌人”68名。他们介绍的经验是:一、拿出“样板”,扩大坦白面,使党的政策具体化;二、依靠群众,慎重定案,做到稳准狠;三、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扩大改造面;四、就地改造、本厂“消化”,“包袱”不上交;五、深挖细找,注意策略,不停顿地打击敌人。

1 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调查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并加编者按。编者按说:“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现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导,以及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干部、医务工作者座谈这篇报导的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一并在报上发表,征求意见,展开讨论。当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已经开始在农村普遍实行的时候,我们提出农村医疗制度的讨论,一定会促进毛主

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进一步贯彻执行。”此后，《人民日报》多次组织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大讨论。

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辽宁省的调查报告：《一所贫下中农掌权的民办小学——从松树小学的成长看农村办学的方向》以及《红旗》杂志编者按。编者按说：“这里有一个比较，一所由国家花钱办的‘正规化’小学怎样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一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办的小学怎样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这个学校打破了种种清规戒律，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入学不受年龄限制，可以按季上学，可以晚来早走，家务重的可以带着弟弟妹妹上学，还在8个生产队里建立4个教学点。自己劳动，办学4年，没有收学生一分钱。贫下中农说：‘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变颜色了’！”

12月17日，浙江省泰顺发生严重武斗和地区封锁事件。温州地区、市革委会负责人提出口号“打到泰顺去，解放全浙南，实现全省一片红”，集中平阳、温州、瑞安等县市2000名武装和后勤人员，调动80多辆汽车和大批轻重武器，到泰顺打了10天10夜，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事后，又在平阳、瑞安、文成等地设立关卡，切断所有交通运输，不准给泰顺运粮食、药品、食盐、化肥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物资，甚至连粮票、布票也卡住不放。指使财政部门，调走周转资金，封闭金库。全县21个粮站，19个断粮关门，120多个商业部门，90%以上关门停业。对泰顺的全面封锁持续达11个月之久。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报导，介绍甘肃省会宁县部份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以外，纷纷被动员去农村、边疆落户。

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批示中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已经下达。为了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更准确地打击敌人，请各地在对敌斗争中，注意下列各点：一、应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在对敌斗争中采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要把斗争对象都看成铁板一块。二、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中央文革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三、坚持群众专政。实行群众专政，在定案时必须要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不要用“群众定案”的口号代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四、在被审查的干部中，须区别是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是尚未定性的“靠边站”干部，不要把两类人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在这一《通知》中加了几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即使是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份（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 一九六九年

1 2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 1 2 期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号召向为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牺牲的知识青年金训华学习。本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并配发了反映金训华事迹的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评论员文章指出:“目的是提倡一下创作刻画工农兵形像的美术作品。”此后,在全国学校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普遍开展了学习金训华的活动。

1 2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载报导:《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认真落实的对敌斗争策略》。报导说:二七工厂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8 3 4 1 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以后于 1 9 6 8 年 1 1 月正式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一方面要分清敌我,划清阶级阵线;一方面要把从敌人营垒中投降过来的多数人改造成新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使敌人的队伍缩小,我们的队伍扩大;二、能够团结争取阶级敌人的家人;三、利用他们的技术力量。报导认为,二七工厂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是:尽可能地扩大坦白面,不是让他们单独交代反动身份和罪行,而且也清理他们的反动思想;不轻易采用群众揪斗的办法,而是采用政策攻心;对少数死心塌地的敌人,坚决揪出,从严惩处;树立“宽严样板”,先后召开七次宽严大会,每次会后,都有敌人坦白交代;帮助清理对象办好家庭学习班,加强对他们的管制和教育。报导说:“一年来,二七工厂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改造工作,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个报导发表以后,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基本经验之一。

1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 1 2 期署名江建农的文章:《论干部插队落户》。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迅速掀起一个下放干部插队落户的热潮的经验。文章认为,干部插队落户同办好“五七干校”、干部下厂当工人一样,是一项新生事物。文章还批驳了干部插队落户中存在的不同看法和问题,如埋没干部、影响国家机关改革、分散难以领导、在田少人多地区增加农民负担等等,认为不能“低估干部下放劳动的政治意义”。1 8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个极其可贵的创举——江西省宜黄县干部集体插队落户调查报告》。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推广这一经验。

1 2 月 1 6 日,《人民日报》刊载《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调查报告》。《报告》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在驻厂 8 3 4 1 部队宣传队帮助下,5 月份成立了新的党委,提高了党员觉悟,纯洁了党的队伍。《报告》认为,这个厂的经验是:一、“从思想整顿入手,普遍提高党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在整党建党中,组织有干部、工人、军宣队党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学习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二、“在‘清除废料’的同时,加强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三、“积极慎重吸收新鲜血液,健全党的组织,实现一元化领导”。《报告》举例说:一个女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中被吸收入党,选入支部领导班子。《报告》介绍说,党委的建立必须具备的条件是:1.大联合和三结合比较巩固;2.进行过清理阶级队伍;3.建立了支部,吸收了新党员。一元化领导必须做到:1.党委、革委会严格按毛泽东思想办事;2.革委会与党委的办事机构合为一体;3.革委会执行党委的决议;4.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报告》发表以后,成为全国整党建党运动的基本经验之一。

1 2 月 2 0 日,新华社报导:《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推动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向前发展》。报导说:驻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工厂、北京南口机车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 8 3 4 1 部队支左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学习这一经验,“全市先后参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报告会和交流经验现场会的在百万人次以上”。电讯介绍了六厂二校的重要经验是:“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引导群众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

资产阶级派性”，“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及时地解放干部”。此后，全国也掀起了学习“六厂二校经验”，深入开展“斗批改”的热潮。

◇ 一九七〇年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在1971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12月7日，周恩来就这一报告给毛泽东写信，全文如下：“主席：根据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中央农林部会同成都军区和西藏党的核心小组组成调查组在西藏进行了蹲点调研，召开了有基层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地讨论了中央的指示草案。然后，他们统一了认识，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纪登奎同志和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据此将中央的指示草案作了某些修改，在上月业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通过。现西藏已集中干部准备学习这两个文件。谨呈阅，请主席予以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畜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12月16日，毛泽东对中共38军党委报告作出批示。10日，中共陆军第38军委员会向中央军委办事组提出《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并报中共中央。《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16日，毛泽东、林彪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毛泽东批示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中共北京军区常委会，后开党委扩大会，揭发批判陈伯达。19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提出《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报告》，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安排。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18日，毛泽东与美国作家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唐闻生、王海容参加了谈话。毛泽东先与斯诺谈了“文化大革命”，毛说：“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一是有走资派。”“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毛泽东告诉斯诺，他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回顾姚文元《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情形时说：“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那时候我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毛泽东回答：“那就早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所以他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毛还说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都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说：“总要有个人崇拜嘛。”“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毛还称“四个伟大”的说法评“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斯诺接着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三种人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斯诺又问：“我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毛承认确此事，但是没有坚持，而且其他的个人崇拜形式出现了，于是有了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毛还反问道：“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毛还对斯诺说：如果没有人喜欢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个人崇拜嘛，这也适合于我。”对于中苏和中美问题，毛泽东说：苏联“要和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中的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是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旅行者来也行，当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我看，1972年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毛泽东在告别时说自己：“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7日，华北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送交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的负责干部449人。李雪峰、郑维山主持了前期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对38军的报告的批示等文件，批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也受到了批评。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出批示，也列入华北会议的学习文件。1971年1月9日后，当时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1971年1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总结性讲话，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分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宣布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司令员郑维山“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1980年10月军委总政治部为郑维山作出《审查结论》；1982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

12月29日，毛泽东对姚文元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报告作出批示。姚文元的报告说：刘少奇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相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

‘右’的路线，就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当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 274 个中央委员，及 1000 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1971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姚文元的报告。此后，全国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批批判所谓刘少奇“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章。赫胥黎的《人类的自然界的位位置》及严复的《天演论》重新予以出版。

◇ 一九七一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该文号召“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共产党要“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主要内容有：“加强党的领导，根本问题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变换各种手法，妄图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代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用资产阶级纲领代替党的无产阶级纲领，从而用资产阶级性质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全党同志，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是党的作风问题，是党性问题。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分裂活动，就一定要搞阴谋诡计。”“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并发出组织传达和讨论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发。《通知》说：“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除了一害。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击。”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要求解决好 6 个问题：一、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公社、大队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共积累，如举办企业、购买农业机械等，在不影响生产队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可以从生产队提取一部份公共积累。二、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或者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他办法，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军烈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搬照套。要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四、社队办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社、队干部补贴工分不能超过《六十条》规定。国家在农村举办文教、卫生

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或者把企事业单位下放给生产队管理的，其开支由主管部门负担，不得转嫁给集体和社员。国家补助给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的经费，不得任意挪用。五、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干部要带头偿还欠款。六、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从1972年1月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

◇ 一九七二年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文章认为：孔子是坚决站在奴隶主立场维护旧制度的儒家代表，商鞅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立法的发家。“法与儒在思想上的论争，是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杨荣国本人一贯的学术观点，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篇评法批儒的文章。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指出，批林要批极右。12月5日，《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中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2月19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在讲话中承担了《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文章的责任。江青在讲话中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张春桥在讲话中说：怎么能说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关于批极右的意见传达到全党、全国。全国对林彪的批判，除外事工作外，只能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由此，中国的人民防空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不断提高。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每年专列人防经费4亿元，国家还要求地方每年自筹1亿元，集体企业自筹1亿元，结合民用建筑建防空地下室每年4亿元，都用于人防工程方面。

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说：“昨天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起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一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不久，自1969年10月起被下放外地的谭震林回到北京。

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南方临时共和国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啊！结果有一派人就掌握了权力，一下就把英国代办处烧掉了。这些坏人都是林彪之流，后台都是林彪。

◇ 一九七三年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刊登署名“钟实”的文章：《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认为教育战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争夺的一个主要阵地”，“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应“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修正主义，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刊登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帅，与老师发生矛盾写的日记，并配发了“编者按”。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也配发了“编者按”。此后，特别是在中小学校迅速掀起了“大破师道尊严”的浪潮。197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又配发“编者按”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以上资料见本刊zk0101d）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毛泽东提议，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跟曾思玉对调；许世友跟丁盛对调，韩先楚跟皮定均对调。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1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人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喜欢自己做皇帝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另外，毛还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并说：“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院校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文章：《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对许世友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另外，毛泽东还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同志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很有必要，大有作为——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孙立哲给知识青年们的信》。《人民日报》“编者按”称，孙立哲和他的同学们，到延安地区插队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孙立哲和20多名同学一起，于1969年1月到延安县关家庄大队插队落户，后来当上了赤脚医生并办起了合作医疗站，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于1972年9月加入共产党。他用自己的事实证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2月21日，新华社报导：自1968年12月22日至今五年来，全国已有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命令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革命的好后代》，介绍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在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的事迹。《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说：“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应当从董良翮进步的事迹中受到启示，鞭策自己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革命干部同样应当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已经下乡的子女向董良翮这样的同志学习，教育还没有下乡的子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另外，10月1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董良翮写的《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变相劳改”的谬论》一文。

◇ 一九七四年

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并配发“编者按”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12月21日至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参加现场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农林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各高等农林院校等单位的代表共180人，辽宁省各类学校代表和市、地文教、农林部门负责人140人。会后，全国掀起了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各报刊、各电台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导，各地组织了大批人员去朝农参观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主要为“社来社去”，即学员经过社队选送入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的社队当农民。与此相配合，教学工作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学员在校学习，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下，即要求学员回到所在社队边学习，边实践。

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说道：“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张春桥、姚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毛说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份，党员一部份，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 一九七五年

12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1975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全文见本刊zk0212e)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提供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推向全国。

~~~~~

### 【往事追忆】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 杨小凯 •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 我写此文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后,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



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名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 ◇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爆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

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后，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副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贻d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 ◇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后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后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后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后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后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后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后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后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后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 ◇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后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后，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